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CONG SHI SHE HUI XUE WU SHI NIAN

天津人民出版社

334-03
824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关系，但这门学科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曾中断了二十多年。目前，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正在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学，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关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这门学科也日益发生兴趣。为了积极配合我国社会学的研究，以及为社会各方面提供社会学的读物，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社会学丛书。

这套丛书除包括新的社会学著作外，还包括一部分尚有参考价值的旧著和外国著作的译本。我们将其中的旧著标明为“旧著重刊”，注明原出版单位和时间，除个别属于技术性的错误外，一般不作修改，以便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研究情况、它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及其缺点。热切希望社会学工作者和读者给予积极的支持、批评和指导。

FH2268

目 录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1)
略谈社会学·····	(7)
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学研究·····	(24)
人才研究和知识分子问题·····	(50)
开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59)
为什么要开展民族研究·····	(68)
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 一些意见·····	(72)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82)
《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选译》前言·····	(98)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图册序·····	(101)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	(105)
三访江村·····	(112)
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	(130)
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142)
农村调查的体会·····	(153)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答《中国青年报》问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相当多，就其主要的来说，是在中国重新建立社会学这门学科。说我是在这事业上奋斗，似乎太重了一些。我只是尽我的能力在完成这个任务罢了。我接受这项任务还只有两年。如果要问我怎样接受这个任务的，我不得不把话推回到半个世纪以前去，说一说我是怎么和社会学发生关系的。

1930年的暑期，我从苏州的东吴大学转学到北平的燕京大学。到了燕京大学我才知道有社会学这门学科。听了社会学系主任给我介绍了这门学科后，我当场填了表，进了这个系。如果这个行动可以说是“下决心”，我就是这样下的决心，而且过了五十个年头，我并没有改变过主意。但是这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下了这个决心。要说明这一点，还得追溯得更远些。

1928年，我毕业于东吴附中。这是个什么年头呢？查一查历史年表，就会知道这正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后的一年。当我在中学里读书时，跟着许多进步的同学们闹学生运动。北伐军进苏州后，我参加了当地民报副刊的编辑工作。革命的潮流激起了象我一样的许多青年们的热情和憧憬。但是

花一现，革命失败了。许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我在乡间呆了一个假期，再回学校时，生活孤独，心情懊丧。青年人受不起打击，感到世道这么复杂，有点泄气。当我进大学时，心里想，做人只要能洁身自好、于人有益就是了。于是选了医预科，打算将来学成了当个医生，替人治治病。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还是不断地来刺激我。学校里又发生了学潮，又有不少平时常在一起的同学被开除或强迫转学了。我安不下心，坐不定了。我想，医生固然能治病，病源却不在个人而在社会，要治病人得先治社会。学医既然先学生理，治社会也先得学点社会原理。这样我才转学燕大开始读社会学的。

我提起这段经过，无非是想说，我在青年时代是经过了一点曲折才走上这条路的。归根到底我还是被当时社会的现实推着走的。但是，我从那时起坚持了五十年，我至今还觉得当时的这个决定是对头的。我到现在还相信要有目的地改造社会需要有科学的社会学知识。

这五十年在这条路上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呢？首先，我入了燕大社会学系对所学的这些课程并不满意，主要是因为这些课程里很少接触到中国社会。读了这些课程我对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发生这么许多问题，还是不清楚。要靠书本去找这些问题的现成的答复，大概希望不大。于是我们又得下决心自己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自己的社会了。那就是想建立中国的社会学。

当然也必须说，不读上几年社会学也不会想自己去调查研究，就是想这样做也不一定会做。书是应当读的，只读书不接触实际解决不了问题。还应当说，当时我和一些同学是有条件

这样做，老师们也鼓励我们这样做，不然是做不成的。

我并不能说，我们这一代人建立了中国的社会学，达到了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目的。更不能说我自己懂得了中国社会。能说的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经想从事于建立这门学科，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还认为正确的路——到中国现有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但是决不能用来代替我们自己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

这种看法我是坚持的，但是在这五十年中却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我没有实践的机会。解放前，从1944年起，由于在后方搞民主运动，在云南进行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停顿了。解放后，1952年各大学取消了社会学系，要搞也不能搞了。我自己却因为参加民族工作，还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搞别方面的民族工作。到了1957年，社会学被错误地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在政治上被划为禁区，我就谈不上做社会调查了。一直要到前年，社会学才重见天日。

在《中国青年报》提出的问题里有“奋斗”两字，我在上面说过这个词似乎太重了一些，这是因为我抚心自问，我如果真的全心全意为这“事业”“奋斗”的话，我在这些年头同样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要不同一些。研究社会有它方便之处，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社会里生活，可以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本人都是一些可以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对象。在十年浩劫里，平时看不到的社会现象到处都在充分表现。当然在牛棚里或在于校里不能作笔记、作统计、写研究报

告 但是谁也不能禁止我们思索问题，琢磨理论。我在这些日子里也这样做过，而且这样做也给我不少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并不能一贯坚持，不然，依靠在大脑里的储存，现在有条件写作时，这一段经历的社会学分析一定能帮助人们对我们的社会理解得更深刻一些。我这样说是指出我这一生中并没有全力用在做这件事上。这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是主观上没有为此“奋斗”应当说是主要的。如果我既下了“决心”而结果并没有把这件事做好，决不能推托其他原因，应当承认自己不够努力。

最后，可以说说我在两年前接受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时是怎样想的了。前两年我实足年龄已六十八岁了，当然可以说是个老汉了。老年人都经历过青年时代，多少也能从回忆中体会到一点青年的情绪。青年却不可能有老年的经历，要青年懂得老人的心情，似乎比较难些。我自己在青年时就不大关心那些老头在想些什么，怎么会这样那样想的。顺着自己时觉得是应该的，受之无愧；逆着自己时就不免觉得这些拦路虎实在讨厌。我现在要说的话，青年们会有什么反应，实在没有把握。我老实说就是了。

任何事都是有两面的。如果说我一听到我们又可以搞社会学了，就欣然从命，“下决心”来参预这件事，那并非实情，至少不是我当时心理状态的全部。在我的一生还能看到社会学重见天日的一天，我自然从心底里感觉到热乎乎的。但是接着我想到的是最好不要找到我的头上来。说是心有余悸也可以，所悸的倒不是又来一次不白之冤，而是任重力薄，怕自取其咎。初生之犊不畏虎，这是青年人的可爱处。有了点年纪，阅历多些，接受一项任务就得计较一下有多大分量，再权衡一下

自己有多大能耐，两头平不了，也就不敢挑这担子了。说老年人世故，这是一个原因。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真是谈何容易。我原本没有学好，又荒疏了这么久，即使有老本本可据，我也教不了。何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多少还可以向国外去搬，而社会科学则必须从自己土里长出来。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得从头做起，加上了那个历史包袱，决不是唤之即来的。我怎敢轻易承担这任务呢？

但是当任务落到我头上，我还是承担了。我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呢？在十年浩劫里我的许多社会学界的老师、朋友没有能象我一样活着过来。我这余生可以说是得之意外。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用它来在事实上证明社会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为含冤而死的死者伸这口气。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向前看，看见的当然不能是我自己这个人，如果只看自己这个人，那就看不多远了。这点也许是老年和青年不同之处。我们这些老人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常存的社会。这种“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历史感也许是“老成”的表现。这种历史感可以使自己多多少少超脱于那个受着生物规律控制的个人。我们要为死者昭雪，我们要为没有出生的后代打算，不要使他们背上包袱，那就是承认个人的一生不过是生命长流中的一环。如果人与禽兽不同，不同之处就在这里。人在集体生活中创造出了个社会，社会固然是由一个个人组成，但是它的生命却超过了组成它的一个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实体，是一个超于个人的实体。个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的，个人是靠这整体而存在的，有如细胞之于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正是维持全身这个机体的健在。我上面所说的历史感其实就是社会实体在个人意识上的

反映。它不是虚伪的，而是真实的。就是这种历史感克服了我对重建社会学的畏难情绪。

我想，既然给我参加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尽管我有点犹豫，有不少顾虑，但是为了前人的遗志，为了我几十年来的信念，为了子孙的好处，我也得勉为其难，多少得出把力，把下一代的社会学者培养出来。于是，我就下了决心。

关于这一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吧。

1980年11月1日

略谈社会学

——对《中国青年报》读者的回答

创建新中国社会学的两年里，我们收到了各地许许多多来信，热情支持和关怀这门学科的重建。去年十一月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从事社会学五十年》一文后，来信更多了。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的青年朋友表示要立志从事社会学的学习和工作，并要求我们给予帮助和指导。看到社会学的事业后继有人，作为老一辈的社会学者是十分欣慰的。我曾说“我们这些老人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常存的社会”。“为了我几十年来的信念，为了子孙的好处，我也得勉为其难，多少得出把力，把下一代的社会学者培养出来”。回答一些问题，做点宣传工作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但往往因工作繁忙，时间有限，力不从心。为了回答青年朋友们的问题，一一复信实在没有时间，我只能把来信中的一些问题综合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答复。

这里不能多说关于社会学内容的话，老实说有些问题一时还不可能讲清楚。我们要建立的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的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创建绝不是那几个人能凭空想出来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它的建立要比其他学科更为困难，需

要我们几代人为之艰苦奋斗，对很多问题才能得到答案。我现在所能做的无非是些鼓动的工作，呼吁一下。希望青年同志们重视这门学科。

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需要社会学

我们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那么究竟怎样理解“现代化”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地研究，提出一些意见供大家参考。

我们要现代化就得引进一些新的先进技术，不引进不行。我们用老办法生产，产量少，成本高，生产力太低了，赶不上人家。因此必须改变一下我们以前的办法，以便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最近二十年，从生产技术上讲，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电子时期。这个变化给当前世界的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二十年里西方国家实际上发生了一次技术革命，而我们却经过了一场浩劫，结果我们和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世界水平，那是必须承认的事实。承认了落后有好处，我们才可以有决心赶上去。怎么赶上呢？首先要把先进技术掌握起来。由于这些先进技术是在英、美和欧洲一些国家产生的，这就发生了引进的需要。那么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是不是“西化”、“洋化”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的也不只是中国，第三世界都处在一个落后状态。现在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很有钱，象科威特、利比亚，它们是靠出卖石油发了财。许多国家用先进科技在他们的地方开发石油，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不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其实是变相

的掠夺资源。如果是这样，这种现代化就是“西化”和“洋化”了。

我们中国人过去也受过这种“西化”和“洋化”的苦，现在站起来了，再也不走这条路了。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和那些“西化”、“洋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是自主的现代化。我们要什么就引进什么，是根据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引进。引进来的科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掌握，要为我们中国人民服务，提高我们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现代化就不是“西化”和“洋化”。

我们说中国式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洋化”，那是因为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用自己的人，来掌握世界上一切新的科学知识，发展自己的生产技术。现代技术发展很快，一年半载就变了。我们不能只跟在人家的后面模仿，必须通过掌握先进科学知识赶上去。日本的不少产品就超过了美国。日本制造的小型汽车省油，他们在能源危机、汽油涨价的浪潮中，打进了美国市场，引起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危机。现在技术发展这样快，就应该有远见，有创造。这种现代化才是自己的现代化，而不是“西化”、“洋化”。

把外国技术引进中国，在中国生根变成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提高国民经济的作用，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很多人把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以为把外国的机器买了进来，就得了。他们不知道就是买到了机器，要机器能正常运转，生产价值，也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条件。因此引进一项技术，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引得进引不进，怎么引进来？买来了机器要能用，用了要产生经济价值。第二，引进了一项技术之后，会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

什么变化？

不久前钱伟长教授到许多地方讲过“系统工程”。“系统”这个概念也适用于社会学。“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东西存在，它是与其它东西相关联的。相互关联的东西形成一个结构，形成一个“系统”。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甲变了，乙也要变。一个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存在于系统中的。

社会也是个“系统”。外国的技术引了进来，进入我们这个“系统”，我们原有的“系统”对于引进来的东西会不会产生排斥？引进来的东西能不能站住？能不能在“系统”中发挥作用？会不会改变这个“系统”？这些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问题。

以农业机械化为例，我们听到过不少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报告，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总是用拖拉机有多少台来表明，可是这些拖拉机在农村里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却很少加以说明的。实际上许多地方拖拉机在农田上干活的少，而在公路上跑得多。前年我到四川成都去参观，看到平原上一丛丛碧绿的翠竹，竹林里两三家，自成村落。我不胜欣赏这种还带着杜甫草堂的遗风。但是再一想，这样分散的农村格局怎样引得进大型拖拉机呢？后来注意到在成都平原确是很少见到拖拉机，所见到的拖拉机也大多是在公路上拉着拖斗运货。外国朋友对我说，搞运输还是买两部卡车便宜，也适用，用拖拉机这么笨重的东西搞运输太不值得。这种情形其实不能说是农业机械化。所以讲机械化不能只讲有多少台拖拉机，要看拖拉机在农业机械化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

上面所说的情形指出了在农村引进拖拉机，必须先具备许

多社会条件，不考虑这些条件，盲目地把一台拖拉机抬进农村里，有些地方就只能搁在那里，根本使用不上。所以有人说，“铁牛不如黄牛，黄牛耕不了田，可以宰了吃肉，铁牛使不动，啥用也没有。”我不是批评在农业现代化中使用拖拉机，我的意思是说，把拖拉机引进农村，不是件简单的事，先得创造使用拖拉机的社会条件。

再说插秧机。我们在好多年前已经有了插秧机，但是在广大稻田里还主要是用人工来插秧，插秧机用得很少。可是日本却在我们插秧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普遍使用了。要说中国人不如日本人，我不相信。原因是在日本农村里劳动力少，有了插秧机大家乐于使用，容易推广和改进。我们的农村里劳动力充斥，按劳动算工分，插秧机就不容易插进来。

这些事说明了我们在实现现代化中，一定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我们要把中国社会在现代化中改造成什么样子，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解决些什么问题，这些都应当心中有数。如果心中无数，盲目地追求数字，在报告上看起来很显眼，浪费人民的钱却不少。

外国朋友称赞我们中国人民那么刻苦，那么听话，那么俭朴。可是我们国家浪费之大，实在惊人。日本是缺少资源，我们不是资源少，而是资源没有用到刀口上去。我们不是贫乏，而是穷困。为什么？心中无数。凭常识、凭道听途说办事。办事只凭“好心”不行。所以我们要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摸一摸。

总之，我们要实现的是符合于我国社会特点的，有创造性的、由自己作主的和自己来搞的，以提高人民生活为目的的现代化。要做好这个艰巨的事业，必须科学地去认识我们中国的

社会，并不断地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就是社会学的任务。可见社会学对现代化是很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把社会学搞起来。

社会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社会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从名称上来讲。一门学科的内容，是这门学科的历史所决定的。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不是中国最先有的。最早提出这个名称的一般说是法国的孔德。

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并不是最早成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最关心的是市场，做买卖，所以经济学出世得比较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主要是当时所谓贫困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化的结果。英国很早就有对贫困的研究，法国也是这样，在这个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了当时的社会哲学产生了社会学。所以社会学的产生是出于当时西方社会的需要。

孔德把对整个社会的研究统称作社会学，因此社会学的领域很大，但是当时实际上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而是从哲学里分出来的一部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各时期按当时社会的需要，对社会现象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别产生了专门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律学、教育学等等。原本是社会学领域就是这样一块块地分出去了。剩下来还没有专门学科去研究的领域才由社会学保留。所以要为社会学下个定义并不容易。学科专门化的趋势还在继续。比如人口问题

的研究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现在有了专门的人口学了。宗教问题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到独立出去的程度，各国的大学里还没有用“宗教学”这个名字来开课，但也不能说它不会出现。

到了我们这一代，社会学里又发生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它重新又伸手到已分出去的各专门的学科领域里去了。它发现这些专门学科里，如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里还有许多园地没有进行研究，而且在各门社会科学之间还有很广阔的“三不管”地带，它于是又拾起来归入了自己的范围。比如传统的政治学大多限于政府的权力和机构的研究，而社会上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力却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权力怎样发生作用，又怎样相互联系等等，成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于是产生了“政治社会学”。传统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供求关系、物价起落等等，而社会上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变动，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很多活动并不在市场上进行的，于是又产生了“经济社会学”。就是这样，社会学穿插到了每一门社会科学里去了。这一类的“社会学”多至几十种。

现在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同志们正在探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思想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问题。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被引进了企业管理的研究领域，逐步重视研究“人的因素”。所谓研究“人的因素”，就是研究人的各种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的关系，研究人和人、人和群体的关系，目的是从精神上物质上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新中国在几十年里，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有丰富经验的，但在某些方面还没有